

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既是历史的课题,又是现实的课题。作为历史的课题,这项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的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在中国学界,历经百年的努力,从南海交通史、中西交通史、中国海外交通史,到中外关系史、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的视野、对象和内涵不断拓展深入,而且成为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热点领域之一,学术影响日益扩大。如今国际上大体有个共识,即海洋丝绸之路或称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东西方之间通过海洋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在古代是以海洋中国、海洋东南亚、海洋印度、海洋伊斯兰等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互通、互补、和谐、共赢的海洋经济文化交流体系的概念。可以这样说,海上丝绸之路是早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海洋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是以海洋亚洲各地的海港为节点,以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以经济与文化交往为主流,包容了各地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形成和平、和谐、共赢的海洋秩序。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变迁,实际上也是寻找海洋亚洲、海洋文化历史实证的过程,深化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研究的过程。

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又是现实提出的课题。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蓝图举世瞩目,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热烈响应者有之,犹豫观望者亦有之,正如马来西亚谚语所云:“风向变的时候,有的人筑墙,有的人造风车。”对于中国的愿景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这是中国为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避免被围堵的防御措施,有的认为是重建明代的朝贡体系,寻求18世纪以前的主导地位,等等,不一而足。对此,中国的解释还不够到位。有评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对海洋理解不够透彻,不善于说海洋的故事,缺乏文化的影响力。这就为21世纪东方和中国海洋文化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研

究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更是时代的需求、社会的需求。

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是论证、阐释、弘扬东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即今天的韩国到中东之间的沿海地带和海域)的海洋文明、海洋文化,改变东方有航海活动没有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旧思想观念。这种旧思想观念是15世纪末开启大航海时代欧洲向东方扩张的产物,那时的西方不知海洋亚洲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把海洋东南亚叫做“前印度”,称海洋东亚为“东印度”,是他们探险发现的新大陆。实际上,他们闯入海洋亚洲以后,搭上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顺风车,那时海洋伊斯兰、海洋印度、海洋东南亚式微,海洋中国因明朝实施海禁从印度洋、东南亚退却,欧洲海洋势力得以轻易地填补海洋权力的真空,用暴力掠夺、征服和殖民的手段,在亚洲海洋上兴风作浪,冲击海洋亚洲世界体系,到19世纪中叶通过发动鸦片战争等暴力手段把亚洲海洋编入西方体制之下,使之成为西方海洋强国争夺海洋霸权的战场。在掠夺、殖民的扩张过程中,他们编造的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是高于大陆文明、农牧文化的先进文明,先进文化的论述,得到广泛的传播,掌控和支配了海洋的国际话语权。日本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的形式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海洋文明,重新塑造日本海洋文化,走上海洋帝国主义之路。沿袭西方扩张型海洋文明大陆—海洋二元对立观的海洋观,现代日本提出建设“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在环中国海第一岛链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在西太平洋建立“海洋连邦”“黑潮同盟”等主张。

现代海洋亚洲的兴起,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到中国、印度、东盟,迎来了亚洲海洋文明复兴的光辉前景。海洋文化的概念从西方发达海洋国家的定义中解放出来,成为新兴海洋国家创新的理念。海洋文化不再只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所有濒海国家、岛屿国家开发利

用海洋进程中产生的文化事象,即在海洋区域的生活模式,涵盖物质、制度、精神的各个层面,从海上和陆地面向海洋的生产、生活的物质创造,到海洋活动群体、民间社会和国家不同主体经略、管理、控制海洋的组织制度、社会秩序,海洋观念、海洋意识、海洋民俗、海洋宗教信仰、海洋文学艺术,无所不包。有海洋交流活动就有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新兴海洋国家的出现,固然有国际环境、时代发展潮流或外来海洋文化的推动,但也不乏本身内生动力,包括海洋资源、海洋空间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海洋人历史传承的潜力。

有魅力才有影响力,从这样的高度反思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还是有一些需要进行反省和改进的地方。现时中国学术界虽然下,没有反对建设海洋文化的意见,但在文化意识上,还是有分歧的,值得讨论。

第一,对建设海洋文化的历史基础认识不同。海洋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人,包括学术精英和舆论精英,仍旧抱着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传统观念,认为当今中国海洋发展是中华文明从陆地走向海洋,从传统内陆文明转向海洋文明。走向海洋,中华文明是后来者。中华传统文明中的海洋基因,只是狭义的“海”的基因,靠海吃海,“洋”的东西我们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不够的。21世纪中国的文明转型,要从传统内陆文明转向海洋文明,或者说,要实现从“大河文明”向“海河文明”再向“海洋文明”的有序过渡。这样的论述,有个共同点,有意无意地绕过中国自己的海洋文明史的问题,没有中华海洋文明的自信,深层次的原因是重陆轻海的社会心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自信来自历史的深处。海洋

史研究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海洋文化和勇于探索、崇尚和谐的海洋精神。中华海洋文明是中华原生文明的一支,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生几乎同时。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制海洋的组织制度、社会秩序,海洋观念、海洋意识、海洋民俗、海洋宗教信仰、海洋文学艺术,无所不包。有海洋交流活动就有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新兴海洋国家的出现,固然有国际环境、时代发展潮流或外来海洋文化的推动,但也不乏本身内生动力,包括海洋资源、海洋空间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海洋人历史传承的潜力。

第二,对中国海上特性认识不同。海上特性是海洋传统、海洋意识、海洋权力、海洋利益的表现。有这样一些流行的说法:大海,在中国没有主体,中国人惯于枕着海涛来做田园之梦;古代航海的中国,绝对不是靠海吃饭的;郑和下西洋只是黄河文明的海上漂移;等等。也就是说,中国的海洋特性是内陆文明向海洋的延伸。这是从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观念推导出来的,缺乏可信度,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质疑和论驳。

其实,中国的海洋特性是由“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所决定的,是海陆一体架构下的海洋性。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不是对立的关系。笔者认为,从国家的角度看历史,宋元明

清时期,王朝统治者曾几次把经略海洋作为国策,但最终又放弃了,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是常态,而作为海洋国家只是“片断”。在王朝大陆性压倒海洋性的时期,其政策是从海洋退缩,与海洋国家一讲海利二讲海权的文化意识背道而驰。而从区域的角度看历史,则体现中国作为海洋国家的一面是连续的。海洋给沿海地方带来商贸利益,聚集庞大的以海为生人口,发达的航运连接繁华的港市,激发航海技术、东西洋贸易制度创新的活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中,扩展自己的海洋权利和利益,与他文化交流对话,形成延续两千年的海洋传统。正是由于沿海地方和民间的海洋发展具有连续性,才使当代中国具有重新选择海洋发展路向的可能性。

在近年来的走向海洋实践中,海洋文化新理念的孕育,带来实践上职能的变化,海洋事业蒸蒸日上。然而,将陆地发展的模式加之于海洋,陆主海从,使海洋陆地化的做法,仍大行其道,令人担忧。如有些地方大规模填海造地,改变了海岸线和海洋生态环境;在海湾、海岛地区修造跨海桥、隧取代海上交通,已使长三角、珠三角的诸多岛屿连为一体,变为半岛。甚至设想未来以修建隧道的方式穿过太平洋,建设一条横跨白令海峡、长达上万公里的高铁,连接亚美两个大洲。这种走向海洋的陆地思维,是和海洋特性相背离的。

第三,对海洋社会的认识不同。所谓海洋社会,亦即在海洋、海岸带、岛屿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海上群体、涉海群体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互动的结构系统”。传统时代海洋社会的基层就是渔民、棚户、船工、海商、海盜等群体。海洋社会是海洋文明发生发展的前提,没有海洋社会的驱动便没有海洋文明。求动(流动、运动、航行)是海洋社会的生活

模式,与农业社会的求稳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话语里,海洋社会群体就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流民”“奸民”“海寇”,是社会最不安定的人群,给予否定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史学界用“商”代替“寇”的提法,为海上走私除罪化,称之为“私人海上贸易”。海寇商人从“犯罪集团”变为“海商集团”,给予正面的评价。这是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开展。但是,因为海洋社会人群的解放先后被王朝所镇压,未能促成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他们为中华文明创造的海洋因素被屏蔽了,学术主流对海洋社会的认同度不到位,沿袭传统观念的提法还有市场,而这很可能对培育海洋意识造成障碍。

其实,流动、运动、航行是海洋社会的基本特征,用陆地社会即农牧社会的组织原理强加在海上人群头上,实现陆地化的管理,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与制度歧视。海洋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和附属,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海洋人群在日常生活实践与社会互动中,与陆地人群是不平等的,他们没有土地,生活机会进一步受到剥夺,只有脱离王朝的户籍控制才有发展的机会,而这又被视为非法,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加以排斥。培育海洋意识,就要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式,逐步消除这种制度歧视和文化排斥。

海洋文化是活态的文化,每个文明时代都充满多元力量、多元价值的竞逐,21世纪的亚洲海洋的海洋文化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振兴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与海洋连邦论竞争,具有现实的意义。在新的海洋时代,实现思维观念、生产方式的改变,赋予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内涵,东方和中国讲海洋故事的能力就能进入新境界,作出新贡献!

(本文摘自李庆新、胡波主编《东亚海域交流与南中国海洋开发》,作者杨国桢,科学出版社2017年2月第一版,定价:262元)

以中道观才能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之间真正找到平衡点,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建立在己文化的价值基础上,同时又反映和吸收整个人类共同利益的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价值因素应该主体来自儒家。

孔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自然都希望在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中保留自己文化的独特个性,使中华民族能以自己独特的身份融入多元化的世界文明之中。作为中华民族之文化认同,维系中国人的社会凝聚的这种“集体意识”,其基本的内容又应该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新浪网曾经做了个网络调查,近两万网民接受调查,七成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这表明在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在“西化”到了一定程度,大家需要回归传统文化保护自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能够强化民族凝聚力,确立民族共同价值观,培育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广阔胸襟。为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建构21世纪文化体系提供保障。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之丰富,包容之博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应该是这一“集体意识”的主体部分,而孔子则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国人公认的至圣先师,因此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

孔子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是由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孔子的人格和思想在生前就吸引了许多人来求学,形成了很大的势力。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与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

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蘧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殁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孔子去世后,他的影响还持续着,扩大着。

北宋理学家邵雍在《皇极经世书》说:“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观物内篇》之六)这就是说,孔子整理“六经”,对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以来文化的进行综合,所谓集大成也。

现代以来有许多学者把孔子看成中国文化史上的泰山北斗,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言:“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华文化,不得不重视孔子儒学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为什么?因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

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吴宓也说:“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具体地说:1. 孔子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2. 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吴宓是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办《学衡》杂志,与新文化运动唱反调,认为西方的苏格拉底、基督犹太、东方的印度佛陀,中国孔子为人类文化的代表。晚年正逢“文革”“批林批孔”,他是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几个著名学者之一,后来还因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多次公开批斗,甚至在批斗中一条腿被折磨致残。柳诒徵也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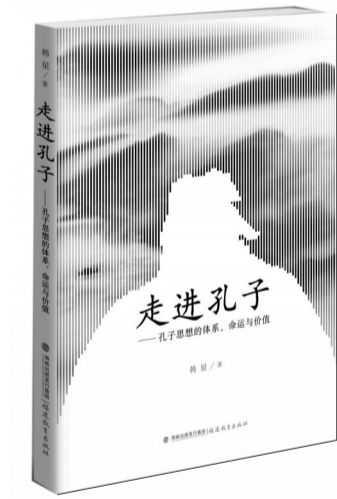
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

总之,孔子的人格及其思想已经融化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当中,孔子在无数的阅读和诠释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今天,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海内外华人中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and 感召力,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通过孔子这个文化象征,可以感召、吸引和凝聚海内外华人,从而增强中华各族儿女的文化认同感、精神归属感,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文化认同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而是在新的时代继承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就以创造新的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文化认同不仅是一种文化立场,更具有国际战略意义。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是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的坐标中进行的,有激烈的争论,持久的冲突,但都是围绕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进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演变为蔚为大观的文化思潮。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到平衡点,这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遗失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中道精神,而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近代以来,

受西方文化的宰制,二元对立思维方式(binary oppositions)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头脑。20世纪以来,中国,则老一直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推动”中国历史,应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处理复杂的思想文化问题及一些具体学术领域的问题,如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唯心/唯物、形而上学/辩证法等;中国政治思想方面的“左”/右倾、进步/落后、革命/反动等;中国文化研究中的新文化/旧文化、封建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白话文学/文言文学、传统文学/现代文学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式转向务实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又防右”,“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以及“黑猫白猫”等。表现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则是既防“左”又防右,不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战略观从冷战思维转向和平发展观,等等。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的思想方法是在三才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人为本的中道观。《论语·尧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中庸》引孔子的话说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论语·子罕》还载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里的“两”就是对立性的两个方面,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矛



盾或矛盾的两个方面。中道思想就是在对立和矛盾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关节点——中,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最后走向“和”。以中道观才能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之间真正找到平衡点,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建立在己文化的价值基础上,又能够回应时代和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能够成为中国人所愿意接受,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同时又反映和吸收整个人类共同利益的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价值因素应该主体来自儒家。在思想(理性)层面,以儒学为主体,向“左”吸收马克思主义,向右吸收民主自由思想,然后整合成新的思想体系。在宗教(信仰)层面,面对多元宗教,也是以儒为主,在历史上已经成功地整合了道教、佛教,形成的以儒为主、道佛辅翼的文化结构的基础上,继续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

(本文摘自《走进孔子——孔子思想的体系、命运与抉择》,韩星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定价:68元)